

孟子的禮樂之教 (下)

張泰祥遺著

軍事哲學思想論著之四

參 孟子保民養民和心防心戰的

軍事思想

二、心防心戰之術

心理作戰，雖是現代的名詞，但我國古代早已盛行這種作戰的方略。如古代兵法所說的：「攻心為上，攻城為下。」孟子所說的「得其民，先得其心也。」「得其心，斯得其民矣。」國父孫中山先生更說：「國者、人之積也；人者、心之器也；國家之治亂，繫乎社會之隆污；社會之隆污，繫乎人心之振靡。」並且說：「吾心信其可行，雖挾泰山、超北海，亦能行之；吾心信其不可行，雖反掌折枝之易，亦不能也。」這些理論，都是心理作戰的寶貴教訓。

(一) 心理作戰致勝之基

談心戰，當然包括心防。心防用在我方，心戰用在敵方；用在我方，人人要有心理上的防禦；用在敵方，事事要講心理上的攻擊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自稱人民領袖的希特勒（Adolf Hitler）曾經說：「仗是在敵人的後方打的。」又說：「要在敵人的心裡，去整垮敵人！」可惜他只是火辣辣的講到心戰，而沒有真正去注意心防，最後他還是失敗自殺了。「尙書」和「詩經」所說的：「上帝臨汝，無二爾心！」「無貳

無虞，上帝臨汝！」如果人人都把純潔的心，交給上帝，那自然會造成心理上的長城，而形成了最高尚、最有力的心理防禦，敵人是不能挑撥離間、縱行其反間之計的。可知心防心戰，兩者都有積極性的作用，缺一不可。

1. 「孟子曰：『誠辭，知其所蔽（蔽、障也）；言其辭之偏謬者，乃障蔽全部之見解。誠音卑，狡辯也，偏頗不正也；』」；「淫辭，知其所陷（淫辭，淫蕩之辭；陷、溺也，謂陷溺迷惑於非禮非義也）；邪辭，知其所離（邪辭，邪僻之辭，離即叛，指背叛王道）；遁辭，知其所窮（遁，逃避也，支吾其言，辭窮理屈也）。生於其心，害於其政；發於其政，害於其事；聖人復起，不易吾言矣。』」——這裡所講的，正是教人要防禦這些「誠辭、淫辭、邪辭、遁辭」的深入人心，淆惑聽聞，鼓動反叛，造成禍亂。也就是要加強團結，防敵分化的心防要領。又孟子答滕文公和畢戰問井地，如「墾無夫里之布」一節，經釋中引「周禮、載師」：「凡宅不毛者（不種桑麻），有里布；凡田不耕者，出屋粟；凡民無職事者，出夫家之征。」鄭註：「宅

不毛者，罰以二十五家之泉（錢）；空田者，罰以三家之稅粟；無職事者，出夫稅，家稅。夫稅者，百畝之稅，家稅者，土徒車輦（音捻）出繇役。」——以上都含有寓禁於征的意思在內。把這心防和廛稅合起來看，乃是從文化宣傳上、和賦稅徵收上講推動心防培養戰力的道理，它是作戰最大成功的因素。

2. 「孟子曰：『桀紂之失天下者，失其民也；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，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得其民有道，得其心，斯得其民矣。得其心有道，所欲與之聚，所惡勿施爾也。民之歸心，猶水之就下，獸之走曠也。故為淵歐（音區）魚者，獮（音場）也；為叢歐（音雀）者，鷓也；為湯武歐民者，桀紂也。今天下之君，有好仁者，則諸侯皆為之歐矣。雖欲無王，不可得矣。』」孟子、離婁上篇。焦循「正義」引段玉裁說：「說文：驅，驅馬也，歐，古文驅字。」孟子皆用古文，其實皆可作驅。」又「為淵歐魚」就是獮捕魚舖在水濱沙石上曬乾，留待天寒不能捕魚時食用。「禮、月令」：「孟春

之月，魚上冰，獺祭魚。」「呂氏春秋，孟春紀」也載此文，高誘注：「獺、水禽也，取鯉魚置水邊，四面陳之，世謂之祭魚。」又「爲叢鵒」，就是鸛捕雀，「爾雅、釋鳥」：「晨風鸛。」郝懿行「義疏」說：「鸛爲隼之聲轉。」隼善捕鳥兔，獵人多畜它，雀就是麻雀。獺鵒魚而淵清，鸛鵒而叢淨，所以稱爲「爲淵鵒魚，爲叢鵒」。以上譬喻諸侯爲行仁政的王者驅民，也就是天下歸仁的意思。」（「孟子、離婁下篇」）。

又「孟子曰：『禹惡旨酒，而好善言；湯執中，立賢無方（執中非執一，無方即不拘一方），文王視民如傷，望道而未之見（「集註」：「民已安矣，而視之猶若有傷；道已至矣，而望之猶若未見）；武王不泄邇，不忘遠（「趙注」：「泄音洩，狎也；邇，近也。」「集註」：「邇者，人所易狎；遠者，人所易忘；不泄不忘，德之盛，仁之至也。」）周公思兼三王（指禹、湯、武），以施四事（1）惡旨酒；（2）爲善言；（3）執中道，立無方、望未見；（4）不泄邇。不忘遠。其有不合者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繼日；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。』」（「孟子、同上」）——古人修養身心的作法，和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有關；而古人的心防和心戰，更要從本身內心作起，必先剋制胸中的敵人（私慾），而後才能剋制外面的敵人（賊寇）。禹、湯、文

、武、周公，都是傳堯舜中道的聖人，其一切開端，都是從自己的內心作起。

3. 「孟子曰：『舜生於諸馮（山東青州諸城縣，有馮山和馮村）；遷於負夏（鄭玄注爲衛地，「尚書大傳說：『舜販於頓丘，就時負夏』）；卒於鳴條（「孔傳」：「地在安邑之西，即今山西的西南境」）；東夷之人也（「趙注」：「在東方夷服之地，故曰東夷之人也」）。文王生於岐周（陝西岐山縣）；卒於畢郢（文王作邑於豐，其卒也還葬畢郢。「趙注」：「畢近於豐鎬之地」）；西夷之人也（「趙注」：「岐山下周之舊邑，近猷夷，故曰西夷之人也」）。地之相去也，千有餘里，世之相後也，千有餘歲；得志行乎中國，若合符節，先聖後聖，其揆（度）一也（二聖所揆度之道，無不同也）。（「孟子、同上」）——按上文所述，乃「五族同源論」，此論可謂創於孟子，東夷、西夷的人能做中國的皇帝，乃一有力的論證。孔子也有「欲居九夷」的意思，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各族，本是同源，都是黃帝子孫，居中國中心地帶的是漢族，居中國四維邊疆地帶的，是滿、蒙、回、藏、乃至其他各族。舜的除四凶，表面上是放逐壞人，實際上是移民實邊，並以中原文化，同化邊民。太史公司馬遷的「史記」，對這五族同源的一事，記載特多；可以說孟子創之於前，司馬繼之於後，這都是做的中華

民族各支派的共同心防工作。孟子眼光如炬，洞燭萬古，令人佩服！

（二）克敵要領、須善「養氣」

孟子善養他的「浩然之氣」，並且說「其爲氣也，並大至剛」，又說他能「直養而無害」。這是孟子和一般儒家不同的特點。用兵要以氣勝，所謂「千萬人，吾往矣」的精神，就是養成先聲奪人的氣勝的道理，古人論證已多，姑不具論；但氣由心生，如何求其「心之所同然」，才是克敵的要領；下面僅就有關事項，加以說明。

1. 「孟子曰：『富歲子弟多賴（釋爲善，又解爲惰，清代阮元謂當讀爲懶；即「沃土之民不村」意。見「說文通訓定聲」，此可釋爲依恃年豐游惰而不事生產）；凶歲子弟多暴（迫於衣食無着，鋌而走險，有劫掠暴亂之行）；非天之降材殊也；其所以陷溺其心者，然也。……故曰：口之於味也，有同嗜焉；耳之於聲也，有同聽焉；目之於色也，有同美焉。至於心則無所同乎？心之所同然者，何也？謂理也，義也（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）。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。故理義之悅我心，猶芻豢之悅我口（芻音酬，草食，即蔬菜；豢音患，穀食之牲畜，即肉類）。』」（「孟子、告子上篇」）。又「孟子曰：『牛山（齊國東南的山）之木嘗美矣，以其郊於大澤也；斧斤伐之，可以爲美乎？……牛羊又從而牧之，是以若彼濯濯也。人見其濯濯也，以爲未嘗有材焉，此豈山之性哉？雖存

乎人老，豈無仁義之心哉？其所以放其良心者，亦猶斧斤之於木也，且旦而伐之，可以為美乎？其日夜之所息，平旦之氣，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；則其旦晝之所為，有枯亡之者矣。枯之反覆，則其夜氣（夜中所生清淨精神，即平旦之朝氣），有不足以存，則其違禽獸不遠矣。人見其禽獸也，而以為未當有才焉者，是豈人之情哉？故苟得其養，無物不長（生長），皆失其養，無物不消（消亡）。孔子曰：「操則存，舍則亡。」出入無時，莫知其嚮，惟心之謂與（歟）？」（孟子，同上）——以上兩節，其一是說領導的人，應正確的體會人性，細微的去領悟人情，都應從「同嗜」、「同聽」、「同美」的事情去着手，而在心理運用上去合乎理義。此如打仗，要有打仗的道理，如果「師出無名」，老百姓是不願去打的。又如加稅，也要有加稅的原因，如果「橫征暴斂」，老百姓是不願負擔的。其二的一節，是說明心的重要，講心防、心戰，不可放失其心，放心失心，何從設防？何從言戰？

2. 「孟子曰：『魚、我所欲也，熊掌、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魚而取熊掌者也。生、我所欲也，義、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義者也。生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故不可為苟得也；死亦我所欲，所惡有甚於死者，故患有所不辟（避）也。如使人之所欲，莫甚於生，則凡可以得生者，何不用也？使人之所惡，莫甚於死者，則凡可以辟患者，何不用也？由是（指義）則生而有不用也；由是（亦指義）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。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所惡有甚於死者；非獨賢者有是心也；人皆有之，賢者能勿喪耳。』」（「孟子、告子上篇」）又孟子曰：「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，（惻隱，見人被禍而心有不忍也。朱注：「惻、傷之切也；隱、痛之深也」）；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（朱注：「羞、耻己之不善也；惡、憎人之不善也」）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（何胤云：「在貌為恭；在心為敬」）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（是非、謂事之與非也）；惻隱之心，仁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也；恭敬之心，禮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禮義知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爾矣。故曰：「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。」或相倍蓰而無算（倍、一倍也，蓰、五倍也，由一倍、五倍以至不能計其倍數者，指善惡二者，相差之程度也），不能盡其才也（「集註」：「所以善惡相去之遠，由不思不求，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。」）（「孟子、告子上篇」）

——前面所講的孔子所說的「殺身成仁」；孟子所說的「舍生取義」；即是儒家教人「臨大節而不可奪」的道理。這種心理，是人人都具備的，所以說「非獨賢者有是心也」。講心防心戰，就要懂得「人之心之所同然」，而後加以適當的領導，才能發生作用。本節後段所說的「人盡其才」的要領，須「先盡其性」，人人能將「惻隱、羞惡、恭敬、是非之心，擴而充之，就必能發揮仁、義、禮、智等德性的能力，更能教人自動的「殺身成仁」、「舍生取義」；如果把它用在心防心戰，自然可以克敵而奏功了。

孟子一生的志節，在正人心，息邪說，尤其對好殺強戰、貪圖富貴的人，更是口誅筆伐、深惡痛絕。所謂「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，是謂失其本心！」所以「求其放心」，孟子嘗說：「仁、人心也，義、人路也，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……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！」又說：「指不若人（手指屈而不能伸），則知耻之；心不若，則不知惡，比之謂不知類（比例）也。」然則要「如之何而後可」呢？孟子說：「有天爵者，有人爵者；仁、義、忠、信、樂善不倦，此天爵也；公、卿、大夫，此人爵也；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，今之人，脩其天爵以要（邀）人爵；既得人爵，而棄其天爵，則惑之甚者也。終必亡而已矣。」——這種人如果得志，必然亡身、亡家、亡國、乃至亡民族，因為他先亡心了！心亡還講甚麼心防心戰？

三、「民本」「民主」之義

一般學者，以為民主制度，來自西洋，中國向來是沒有的。可是明代末季黃黎洲的「明夷待訪錄」反覆講到中國在秦代以前並不重視君權，而有民權的意味；漢代以後，一直到明代以前，

又重視相權（宰輔的權），君權也沖淡了很多，可見君王專制的流毒，到明、清兩代，才是它的全盛時期。這一點，我們再從古典中看，更足以證明：「如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」；「天聰明自我民聰明，天明威（畏）自我民明威（畏）」；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。」這些道理，並不只是「國以民為本」的民本主義，而確實具備了民主的範型。到了戰國時代，由孟子提出民主的主張，更如春雷驚蟄，轟醒了暴君權臣的昏聩頭腦。

(一)民主政治，起於古代

孟子曾說：「不得乎丘民，不能為天子。」按丘是十六井「井地」的區畫，「丘民」就是田野的人民。合計十六井，是一萬四千四百畝，一百二十八家；管子百家為里（明代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），乃是一種基層的組織，得乎「丘民」，即是得乎各丘（各里）的民，等於是全民投票的選舉。孟子說到這裡，雖未明白提出人民有選舉權，却含有選舉的事實在內。但其更進一步的地方，是提到了罷免權的行使。並且由「民主」又進一步標出了「民本」；而「民本」是以全民為本，不是代議士制的虛偽民主。一般人以為「民本」不及「民主」，其實是誤解了儒家的意思。分述如後：

1.「齊宣王問卿，孟子曰：『王、何卿之問也？』王曰：『卿不同乎？』曰：『不同，有貴戚之卿，有異姓之卿。』王曰：『請問貴戚之卿？』曰：『君有大過則諫，反覆而不聽，則易位。』（趙岐注：「

貴戚之卿，反覆諫君，君不聽，則易君之位（即罷免），更立親之賢者。」）王勃然變乎色！曰「王勿異也，王問臣，臣不敢不以正對。」王色定，然後請問異姓之卿，曰「君有過，則諫，反覆之，不聽，則去。」（「孟子、萬章下篇」）——按「貴戚之卿」，是王室的貴族；這個所謂「易位」，就是實行罷免權，雖非全民的投票，但也是古代重要的掌握大權的有錢有勢的人，類似投票的舉動。和西方初行民主的德謨克拉西（Democracy）制度，有些相像；他們的議員，都是從貴族或有錢有地位中的人選出來的。它所組成的也類是貴族的議會。

2.「萬章問曰：『堯以天下與舜，有諸？』

孟子曰：『否！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』
「然則舜有天下也，孰與之？」曰：『天與之。』曰：『天與之者，諄諄然命之乎？』曰：『否！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』曰：『以行與事示之者，如之何？』曰：『天子能薦人與天，不能使天與之天下；諸侯能薦人於天子，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；大夫能薦人於諸侯，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。昔者，堯薦舜於天，而天受之；暴（音僕、顯示）之於民，而民受之；故曰：『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』曰：『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，暴之於民而民受之，如何？』曰：『使之主祭，百神享之，是天受之，使之主事，百姓

安之，是民受之也。天與之，人與之，故曰：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舜相堯二十有八載，非人之所能為也，天也。堯崩三年之喪畢，舜辟（避）堯之子於南河之南，天下諸侯朝覲（音枰）者，不之堯之子而之舜；訟獄者，不之堯之子而之舜；謳歌者，不之堯之子而謳歌舜；故曰天也。夫然後之中國，踐天子位焉。……「泰誓」（尚書篇名）曰：「天視自我民視；天聽自我民聽。」此之謂也。」（「孟子、萬章上篇」）——這一篇完全談的是「民本」的政治。

胡毓寰「孟子本義」說：「孟子前舉朝覲、訟獄、謳歌歸舜，僅可證『民受之』，而不足證『天與之』。故復引『泰誓』二語，申明其義，言民之視聽，即天之視聽；民歸之，即天與之。是民歸之為其實，天與之，特假設之辭耳。儒家所言天意，大抵類是。從來篡奪之酋及創教之主，類多託言受上帝天神命令，拯救萬民，使萬民信而從之，因而攫取高位。惟儒家既言天有意志，復不信鬼神靈術，故孟子釋舜受天之義，不言舜受上帝符瑞夢兆，只云諸侯民衆歸之，是其所言事實上本屬民也，而仍歸之曰天者，蓋儒家既信仰天，復不全信賴天；彼殆以宇宙一切事物之成因，為具天人二元者也。（其實儒家注重天人合一，既合一，就不為二了）。天與人歸，從古以來，就有這種說法，所謂「人心相向，天命攸歸」，乃是一而二、二而一的。如大甲曰：「顧諟天之明命」；詩曰：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」

「都是從天命來說的，俗話說「聽天由命」，也含有此意，而孟子所說的卻更進一步，一面是破除迷信，一面又寓有至理，證明天心就是民意，歸於一元，並非二元。

(一) 君主人民、關係輕重

夏、商、周三代以上，貴民；以下，貴君。從秦始皇起，自認德符三皇，功高五帝，而稱為「始皇帝」。此後變本加厲，君權日高，使老百姓喪失了原來的地位。孟子當各國諸侯，各自要滿足他的「大欲」，而「草菅（音兼）人命」的時候，特提出「民貴、君輕」的說法，當頭棒喝，啓聾振聵，立懦廉頑，真足發人深省。

1. 「孟子曰：『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。』（按社是土神，稷是穀神，為古代天子諸侯所分別祭祀的。『白虎通禮論』說：『王者所以有社稷何？為天下求福報功，人非土不立，非穀不食，故封土立社，示有土也；稷、五穀之長，故立稷而祭之也。』古代有國家的天子、諸侯，必立社稷，所以社稷，在今天可以解釋為國家。）是故得乎丘民，為天子；得乎天子，為諸侯；得乎諸侯，為大夫。諸侯危社稷，則變置立賢君，這裡面含有罷免，也含有選舉，詳見前節。）犧牲既成（牛羊豕已肥篤）；粢盛既潔（粢盛，音茲成，黍稷稱粢；在器稱盛）；祭祀以時，然而乾旱水溢，則變置社稷。」（『孟子、盡心下篇』）——這是說毀去舊社稷、建立新社稷

，也就是除去舊神而另立新神。合起來說，君不盡職，就廢君另立；神不盡職，就廢神另祀。這種思想，不是後世腐儒，斗方名士，所敢說的。孟子何以如此大膽？

一是因為孟子能養浩然之氣，至大至剛，不怕以身殉道，所謂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；只見真理，不計生死。這是孟子本身的寫照。二是痛心疾首，憐憫亂世的「民不堪命」，本想以戰止戰，以殺止殺；但當時舉世並無「王者之師」的天吏，來「伐罪弔民」；同時世變日亟，世運日衰，也無法等待王者的興起。所以孟子只好破釜沈舟的豁出去，主張澈底改變君主專制的制度，特引古例，想託古改制，來從事民主的選舉權和罷免權的建立，免得為爭王位而打仗。孟子距今約二千多年，其說在當時甚新，關於孟子所說的「民本」，並不是比「民主」次一等的主張，而是比較初步的或虛偽的民主之更進一步的作法，因為今天歐美國家的選舉，並不能真正擺脫金錢、權勢和派閥的操縱運用。那裡會比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」的「民本」更好？如果確實做到真正民主而又確實實的以民為本，那才是釜底抽薪，永遠不打仗的妙着。也可以說是先天的最高的消弭戰禍的方法。

2. 「公孫曰：『道則高矣美矣，宜若登天然，似不可及也！何以使彼為可及而日孳孳

也？』孟子曰：『大匠不為拙工改廢墨；羿不為拙射變其穀率。君子引而不發，躍如也；中道而立，能者從之。』又孟子曰：『天下有道，以道殉身；天下無道，以身殉道；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！』（『孟子、盡心上篇』）。——用現代的流行語來形容孟子，可以說他是「死硬派」，決不猶疑，決不妥協；他說的是「道」。民貴、君輕是「道」；以身殉道的道，也是「道」，真可謂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、非道也。」

3. 孟子曾幾次提出了「射」的問題，射道，更是一種全民軍事教育的道。但射的要訣，在氣凝、志一、神悟、心專，決不可猶疑動搖，爭強鬥狠，它的要訣如下：(1)「孟子曰：『仁者如射，射者正己而後發，發不中，不怨勝己者，反求諸己而已矣。』」（『孟子、公孫丑上篇』）。(2)「逢（音朋）蒙學射於羿，盡羿之道；思天下惟羿為愈於己，於是殺羿。孟子曰：『羿亦有罪焉！……』」並舉出庾公子斯，不射他老師的老師子濯孺子為例。因為尹公之他（音拖）是端（正）人，其所傳弟子必然也是端人。這是批評羿不擇徒，所以遇害。（『孟子、離婁下篇』）。(3)「孟子曰：『由射於百步之外也，其至爾力也；其中非爾力也。（至由力、而中由智。端人非愚人必有智巧。』」（4）昔者趙簡子（鞅）使王良與嬖（佞倖的人）奚乘（駕車

。王良即晉大夫郵無恤，字子良，所謂「御良」，也名孫無政，乃趙簡子御者；趙簡子叫他替嬖倖的人名奚的駕車射獵，終日而不獲一禽，嬖奚反（返）命曰：「天下之賤工也！」或以之告王良，良曰：「請復之！」疆（勉強）而後可。一朝獲十禽。嬖奚反命曰：「天下之良工也！」

簡子曰：「我使乘汝乘。」謂王良，良不可，曰：「吾為之範我馳驅，終日不獲一禽；為之詭遇，一朝而十；詩云：不失其馳，舍矢如破；我不慎與小人乘，請辭。」御者且羞與射者比（阿黨），比而得禽獸也？……任己者，未有能直人者也」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篇》）。——這是說射是正道，不是詭道；不可任己以從人。能守正道，就是不為拙工廢繩墨的「大匠」，也就是輕君貴民不肯逢迎人主的大丈夫。

孟子反覆主張「禮樂之治」以後，深憾其不能行於當時，不得已才降格相求，來從「仁者無敵」、「王者之師」、「弔民伐罪」、「仁心仁政」等政略戰略和心防心戰來教民用民。立意不為不深；用心不為不苦；可惜時人不能瞭解他的苦心孤詣，因而他在最後領悟到，要用民主選舉罷免的方法，來除去暴君，而主張民主的政治革命，這才是垂訓萬古的大原則、大道理。可惜自孟子以後，無人能說，無人會說，也無人敢說。直到快兩千多年後的明末清初，黃黎洲的「明夷待訪錄」出世，才發揮了孟子的精神意志和看法

想法。可是要真正做到，還要等待二百七十多年以後國父 孫中山先生的推翻滿清，創建民國，才能實現理想，達到目的，儒家革命理想的實現，真是談何容易！

肆 結論——世衰道危、禮崩樂壞的救世之法

正當春秋末世禮崩樂壞的時候，孔子應運而生，但他不是帝王，不能制禮作樂；幸而孔子作「春秋」，褒善貶惡，代行天子賞罰的大權；孟子說：「王者之迹息而「詩」亡，「詩」亡而後「春秋」作。」又：「孔子作「春秋」，而亂臣賊子懼！」這也是由於禮樂不能再興，孔子想出不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方法。所以孔子說：「知我者，其為春秋乎？罪我者，其為春秋乎？」同時又刪詩書、定禮樂，如孔子「自衛反（返）魯，而後樂正。」並且對他的長子伯魚耳提面命的說：「一不學詩（即奏之以音樂，行之以歌舞的詩），無以言（讀詩以雅言，雅言即官話亦即國語）！」又說：「不學禮（即規定制度、秩序、倫常、舉止的禮），無以立（包括「興於詩、立於禮、成於樂」的意思）！」這種命令式的、嚴正的、沉痛的話，孔子平時是很少說的。我們研究禮和樂的軍事精神和軍事思想以後，要透澈的明瞭這一點。但是今天禮樂的問題，雖然重要，還是另一個層次的工作，而當務之急的，是要好好的保衛民主政治，鞏固憲政基礎；不要讓「共產」的極權政治，取而代之！而且要用民主來消滅極權，用自由來打倒奴役，那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和最大的願望。

南宋孝宗趙昚（古文慎字）御製「進經筵東坡（蘇軾）文集序」說：「成一代之文章，必能立天下之大節；立天下之大節，非其氣足以高千古者，未之能焉。孔子曰：『臨大節而不可奪，君子人與（歟）？』孟子曰：『吾善養吾浩然之氣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於天地之間。』養、存之於身，謂之氣；見之於事，謂之節；節也、氣也，合而言之，道也！以是成文，剛而無鉞；故能參天地之化，關盛衰之運。不然則雕蟲篆刻，童子之事耳，烏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？」這裡說到了孔孟的「節」與「氣」，真足以凜凜千古，為萬世師。

我們再從現代的眼光，來看孔子、孟子，最好拿政略、戰略、和技術、戰術、尤其是藝術，綜合的來加以論證。才能夠明瞭孔孟淵深博大之教的宗旨。讓我們且從現代回溯古代來談談戰略思想的演進。「美軍作戰綱要」說：「平時和戰時，發展及運用國家的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心理與技術等國家的一切能力資源，並擴張其他一切國家資產，以達國家的藝術和科學，稱為國家戰略。」又「美國海軍軍語辭典」說：「戰略是運用一國的全部國力，以支持國家政策的藝術和科學。」從這再上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英國兵學大師李德哈達（Liddell Hart）說：「戰略是分配和運用軍事力量，來貫徹政策所策定的目標之一種藝術。」在這以前有法國的約米尼（Jomini）會著「大軍作戰論」（Traité des grand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），他所下的定義說：「戰略是在戰場上，指揮大軍作戰的藝術。」

「德國的克勞塞維茲 (Clausewitz) 却說：「戰略是組合各別的戰團，以達戰役目的的藝術。以上所引的都說到戰爭的藝術，是古今相同的一點。所謂藝術的，就不是科學的，藝術 (Art)，含有技巧和思考的活動，意義有些和技術相當而又不完全相同。同時它更含有美的價值的活動，而由這活動獲得的產物，又和美術 (Fine-art) 相同。而科學 (Science)，則是有組織、有系統的知識，較為程式化；尤其自然科學，更是如此；它和活用的藝術不同。如此說來，軍事的戰略，擴展到政治、經濟和社會各方面，更要着重其藝術性和藝術化。」

以上是從各國兵學家，或戰略家的說法，求得其相同之點。現在更從各個國家的主張來看：首先說到美國，她把戰略擴大了領域，是指國家戰略來說的。至於傳統性的戰略，就要加上「軍事」兩個字，而對打仗的野戰用的就只稱「戰略」或「戰區戰略」，以示分別。其次蘇俄所謂戰略，凡對指揮軍事來說的稱為「軍事策略」；在這以上的歸屬於國家層級，而稱為「軍事科學」；對打仗的野戰用的，却名之為「作戰藝術」。再次是英國，也把戰略歸於軍事的範圍，越出這個範圍的，叫做「大戰略」。至於法國，她把戰略，歸之於較大的政、經、軍、教的綜合性範圍。以上所說的軍事性戰略的擴大，而籠照到各方面。正和孔孟的禮樂之教的作用一樣。禮教、樂教的軍事精神和軍事思想，筆者已另著專論發表，不贅。這裡僅再略為提到孔子的用民教戰的說法：如「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！」「善人教

民七年，亦可勝殘去殺矣。」以及孟子的「仁者無敵」、「王者之師」、和「可使挾槌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。」都是講的用民教戰的國家戰略。因此可以說孔孟的禮樂之教，就是今天黨政軍民聯合作戰的大戰略。傅斯年在「中學軍訓感言」中說：「西洋人不分文武、退伍官兵，皆可就人民的職業，而一一般在戰時又可召之入伍。惟其如此，才使國家有一個國民，便有一個國民的實力。」並列舉漢朝「文官上馬殺賊，下馬草露布。」和「唐設府兵」、「明設衛所」，作為軍民不分的例證。古代儒家中有這種作為的人，就是管仲（漢志列為儒家，而非法家），他實際在政治上是有成就的人，他說「遠近一心，眾寡同力；則戰可以必勝，而守可以必固；……此正天下之道也。」這幾句話，也正是孔孟之道。

最後要引孟子所述孔門弟子稱贊孔子的話，和孟子自勉的話來作結。公孫丑問孟子：「宰我、子貢，善為說辭；冉牛、閔子、顏淵，善言德行（音幸），孔子兼之，曰：『我於辭令，則不能也。』然則夫子既聖矣乎？」孟子說：「惡（音烏）！是何言也（耶）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：『夫子聖矣乎？』孔子曰：『聖則吾不能，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。』子貢曰：『學不厭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；仁且智，夫子既聖矣。』夫聖，孔子不居，是何言也？」又說：「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；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遠則遠；孔子也。」公孫丑又問：「伯夷、伊尹，於孔子，若是班乎？」曰：「否！自有生民以來，未有孔子也。」「然則同與（歟）？」曰：「有，得百里

之地而君之，皆能以朝諸侯，有天下；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皆不為也。是則同。」曰：「敢問其所以異？」曰：「宰我、子貢、有若，智足以知聖人，汗不至阿其所好。宰我曰：『以余觀於夫子，賢於堯舜遠矣！』子貢曰：『見其禮而知其政；聞其樂而知其德；由百世之後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違也。自有生民以來，未有夫子也！』有若曰：『豈惟民哉？麒麟之於走獸，鳳凰之於飛鳥；泰山之於丘垤，河海之於行潦；類也。聖人之於民，亦類也。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，自有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！』」

可惜孟子就沒有門人能像稱贊孔子那樣來稱贊他，幸而孟子說明了他的志趣。如：「說（音稅）大人，則藐之，勿視其巍巍然。堂高數仞（一仞八尺），榱題數尺（指屋簷）；我得志弗為也。食前方丈，侍妾數百人；我得志弗為也；般樂飲酒（般音盤，般樂謂盤桓為樂，無休無止），馳騁田獵，後車千乘，我得志弗為也。在彼者，皆我所不為也；在我者，皆古之制也；吾何畏彼哉？」這是孟子至大至剛志氣的流露，千載之下，實在令我們景仰不置！三復孔子孟子的禮樂之教，至矣盡矣，直欲無言，還有什麼好說的！

——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廿五日——

